

2008卷(第2辑) (总第14辑)
No. 2 2008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 郭金兴 中国经济增长30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 罗润东 郭建强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30年发展回顾
- 李 政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与评析
- 太 平 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演进
- 刘 瑞 30年来国家计划实践与理论互动:从计划到规划
- 蔡继明 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收入分配制度演变与分配理论创新
- 谷 成 中国财政分权的特征与改革取向
- 张文春 王薇 李洋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 丁守海 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 刘文革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研究——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
- 张建君 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与理论创新
- 顾 严 所有制结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

2008卷 (第2辑)

No. 2 2008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8 卷. 第 2 辑: 总第 14 辑/柳欣, 张宇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300-09845-6

- I. 政…
- II. ①柳…②张…
- III. 政治经济学-文集
-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875 号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8 卷 第 2 辑 (总第 14 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0 mm×25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1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8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 版 说 明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启蒙思想、传承文明、推进科学和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推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决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经济学评论》系列文集。本文集的思想是：尊重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同时对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注重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兼容并蓄，并期望在不同学派和理论的对话中寻求政治经济学新的主流；鼓励科学创新，同时崇尚严谨学风，追求学术规范。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02 年 10 月

目 录

中国经济增长 30 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郭金兴 / 1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30 年发展回顾	罗润东 郭建强 / 26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与评析	李 政 / 36
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演进	太 平 / 51
30 年来国家计划实践与理论互动:从计划到规划	刘 瑞 / 70
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收入分配制度演变与分配理论创新	蔡继明 / 84
中国财政分权的特征与改革取向	谷 成 / 99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张文春 王 薇 李 洋 / 110
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模式	丁守海 / 126
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方式比较研究	
——以中俄改革战略演变为背景的分析	刘文革 / 146
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与理论创新	张建君 / 161
所有制结构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研究	顾 严 / 170

Content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30 Year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and Prospects	Guo Jinxing / 1
The Review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in Last Three Decades	Luo Rundong, Guo Jianqiang / 26
A Historical Review o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Li Zheng / 36
The Model of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Tai Ping / 51
A Combination of Practice With Theory In 30-Year Planning Management Reform In China: From Planning To Programming	Liu Rui / 70
From th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Performance to the Distribution Based on Factors of Production—the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Theory in 30 Years of China's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Cai Jiming / 8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Main Features and Reform Orientation	Gu Cheng / 99
The Decision of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the Evolu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30 Years of China's Reforming and Opening-up	Zhang Wenchun, Wang Wei, Li Yang / 110
An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Mode	Ding Shouhai / 12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Mode—based on reform of China and Russia	Liu Wenge / 146
Theory Innov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Chinese Model	Zhang Jianjun / 161
The Mechanism of Ownership Structure's Impacts on Income Distribution	Gu Yan / 170

中国经济增长 30 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郭金兴

内容提要 本文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试图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对二百年前欧洲奇迹的回应。中国经济奇迹可以从经济发展战略引发的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以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形成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决定中国奇迹发生的主要因素仍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在未来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作者 郭金兴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改革开放 30 年来，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因为它不仅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方式，使之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随着其日益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问题更多地成为世界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经济转轨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广泛的借鉴，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由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的不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问题，常常存在着很多争论，并在争论中取得了一些共识，从而增进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试图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实际上应当视为是对 19 世纪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的回应；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从经济发展战略、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等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奇迹是否能够继续。

一、历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比较：从历史大分流到中国奇迹

坚持边际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马歇尔的名言，“自然不能飞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绩效的巨大差异？一个自然的解释是，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迅速增长的一些条件，但是特殊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环境限制了恰当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政策使经济迅速增长的潜力转变为现实（帕金斯，2006）。帕金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的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及其增长潜力。显然，过去 30 年奇迹般的增长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中国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与西方世界相比，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从领先到落后再到奋起追赶，只有从这幅气势恢弘的历史长卷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发生的中国奇迹的准确含义。

（一）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与中国奇迹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大致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口总数相当（李中清等，2004）。在近代以前的农耕社会，人口规模及其增长被视为发展的主要标志。庞大的人口规模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在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发达程度。从张宇燕、高程（2006）的文献综述来看，在 16、17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 GDP 和生活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运作状况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并不逊色于西欧，在科学技术这样的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实际上，直到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与欧洲地区相近，甚至在某些重要指标方面仍处于领先的地位（Pomeranz，2000）。但在 19 世纪之后，中国与欧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工业革命首先从英格兰兴起，而后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国家，继而扩散到美洲殖民地。工业革命在一些主要产业上的技术突破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中国经济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长期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状态，因此，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了。根据 Maddison（2007）的估算，1820 年，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世界 GDP 总量的 32.9%，超过了欧美的总和，后者比重仅为 28.4%。至 1952 年，中国仅占世界 GDP 的 5.2%，而欧美的比重上升到 56.8%。按照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1820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600 美元，约相当于同期欧洲和美国的 55% 和 48%；而在 1952 年，这一比例分别下降到 12% 和 5%。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均 GDP 大约每年下降 0.1%，而欧洲和美国分别增长 1.05% 和 1.61%。在 18 和 19 世纪之后，中西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出现了重大的差别，在西方世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而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中国迅速衰落，经济史学家称之为历史大分流（Po-

meranz, 2000)。①

中西方长期力量的相对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更令世界惊奇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极快的增长速度，接近于10%的年均增长率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成长最迅速的经济体②，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地缩小。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欧洲和美国的8.9%和5.3%，而在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8.7%和16.5%（Maddison, 2007）。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9%上升到2003年的15.1%③，而同期欧洲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7.8%和21.6%下降到2003年的21.1%和20.6%（Maddison, 200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人瞩目，被恰当地概括为“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9）。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对中西方经济比较的关注。

在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交替成为领先者与挑战者，其经济发展的模式、绩效及其成因应相互比较，互为镜鉴。本节关注对历史大分流的各种竞争性的解释，相互影响的三类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即要素禀赋、技术进步及制度环境。中西方之间在三类因素上的差异构成了对于历史大分流的不同解释。不同的解释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着不同的含义。通过比较各种解释的逻辑脉络，本文试图说明当前中国的经济奇迹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对历史大分流的回应。

（二）工业革命与技术进步

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是导致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直接原因，这也是“李约瑟之谜”所强调的重点。英国在纺织、煤炭、钢铁和陆地运输等关键性部门取得了重大并且是相当突然的突破，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并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使欧洲地区的科技水平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康乾盛世”，但经济增长模式却陷入马尔萨斯式的“高水平陷阱”，经济繁荣使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压力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增加了粮食产出，从而使人口进一步增加，但由于工业缺乏实质性的发展，人均收入却处于停滞的状态（Elvin, 1973）。从1700至1820年，中国人口由1.38亿增至3.81亿，增加了1.7倍，同

①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被概括为“李约瑟之谜”，即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运用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但现代科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文贯中，2006）“李约瑟之谜”所强调的创造与运用科学技术的差异是形成历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原因，因此，历史大分流的解释涵盖了“李约瑟之谜”，并且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

②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高估了中国GDP增长速度，经过调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6%~8%（岳希明等，2005）。即使如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增长较快的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③ 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的同时，由于统计制度与统计方法的问题，服务业增加值的绝对水平以及整体经济规模被低估（岳希明，张曙光，2002）。而且，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实际产出和生活水平时，应当以购买力平价代替官方汇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欧美等高收入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往往高于官方汇率，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1990年大约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而官方汇率为4.7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武晓鹰，2000）。因此，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与官方的汇率水平，中国GDP水平将被低估。

期欧洲人口仅增加了 69%，但中国人均 GDP 没有增长，而欧洲增长了 18% (Maddison, 2007)，这种增长方式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化 (Elvin, 1973)。中国这一没有发展的增长被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involution)，以区别于西方由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黄宗智, 1992)。

如果中西方 18 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差异是由于技术水平不同造成的，那么，中国可以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通过模仿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技术传播的成本，人力资本的积累降低了技术学习的成本。然而，仅仅依靠技术的模仿显然无法实现经济赶超，中国将难以实现由跟随者到领先者的转变。而且，随着应用的技术趋近于前沿水平，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下降，中国将不得不放慢追赶的步伐。因此，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而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无疑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技术水平的差异仅是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直接原因，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何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相似的条件下，西方世界而不是中国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并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强调由制度因素决定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方面的差异，另一种解释强调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技术选择的影响。在中西方的历史比较中，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不仅应该解释 16~18 世纪以后中国为何衰落，也应解释在此之前中国为何领先 (文贯中, 200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复杂现象，正如以下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不同的理论为了对这一复杂现象增强解释能力，常常需要阐明制度、禀赋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

(三)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长期增长

林毅夫 (1994) 分析了前现代时期与现代时期技术发明方法的差异。前者主要来自于经验，人口规模是决定技术水平的首要因素。中国一直拥有庞大的人口，大约相当于欧洲人口的两倍，因此，在前现代时期中国技术更为先进。但在 17 世纪以后，实验方法成为技术发明的主要方法，解除了人口规模对于技术发明的约束。实验方法的普及以及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中国和技术竞赛中落后于西方。之所以中国没有实现科技发明方式的转变，是由于科举制度造成的激励结构使然。竞争性极强的科举考试通过提供最荣耀的职业，吸引了众多的人才，使之没有兴趣积累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因此，制度因素是决定中国近代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文贯中 (2006) 认为林毅夫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16 世纪之前的漫长时期，印度人口规模比中国更大，却没有发展出与中国相当的实用技术；明清两朝人口几倍于宋朝，即使科学技术与制度创新不能与欧洲相比，但与宋朝相比，显得十分萧条；最为重要的，为何西方能够在 15 世纪后找到新的发明模式。

诺斯和托马斯 (1973) 将西方世界的兴起视为一个长期的渐进式过程，市场扩展、劳动分工、小规模的技术创新、普通民众涓涓溪流般的资本积累均是这一历史长卷的组成部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诺斯 (1981) 提出了更一般化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更完备的产权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状

况，带来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进一步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但也增加了交易费用。组织变革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创新成本，扩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提高了创新的收益，由此产生了工业革命。

诺斯及其合作者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理论，并对西方世界经济史进行了分析，但并未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韦森（2006）以“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为核心，概括西方世界和清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动态演化以及内在因果关联机制，以解释西欧国家如何成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经济长期增长，而中国却为何没有实现同样的目标。“斯密动力”是指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自发扩展的内在机制，市场扩展加速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由此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布罗代尔钟罩”是指由于受到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的制约，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自我扩展，如同被困在与世隔绝的“钟罩”内。西方国家在持续和路径多样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实现了分工的深化和市场扩展，并导致了后来的科技革命。制度变迁、斯密动力和科技革命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使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反观清代中国，在制度演化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虽然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展所必需的有效的财产法律制度以及支撑财产法律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治未能形成，使得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各地市场经济处于无形的布罗代尔钟罩之下，最终未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经济增长质的飞跃。按照韦森的观点，中西方分流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世界实现了制度变迁与演化，而清代中国处于制度内卷（institutional involution）的状态。

了解了制度因素对于科技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仍要追问为何中西方会出现“制度分叉”。宗教、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是先于正式制度的形成而存在的。诺斯（1981）将意识形态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即使有着较为完备的产权制度也难以约束“搭便车”的行为，而“搭便车”行为将损害经济组织运行的效率，恰当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搭便车”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诺斯分析了一定制度安排下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并未说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制度变迁。韦伯（1978，1991）通过对中西方宗教与文化的比较，说明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缺少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

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形成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充分条件，而且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在明朝后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不利于商业的传统观念出现了变化，勤俭、守信、逐利等观念逐步融入新的精神伦理中，但并未对有利于产权保护的制度变迁提供足够支持（张宇燕，高程，2006）。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 20 世纪后半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等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林毅夫等，1999）。

（四）资源约束、资源暴利与技术选择

对于技术水平差异的另一种解释强调了要素禀赋变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彭慕兰（Pomeranz，2000）对中西方 18~19 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生产、消费、市场发育、劳动分工等方面说明中西方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并不具备渐进式制度变迁所暗示的那种差异。例如，在 1750 年前后，中国人口摄入的食物热

量与欧洲人口相当,而且预期寿命更高,死亡率更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欧洲同样面临资源约束,如果无法突破这一约束,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与中国相似的内卷化增长道路。因此,彭慕兰所要解释的问题并非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经济最发达的中国江南,而是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江南?

彭慕兰认为一些偶然因素改善了欧洲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从而走上了不同的增长道路。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大陆使英国获得了意外的资源暴利(resource bonanzas)。英格兰从新大陆进口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尤其是粮食、棉麻、建材和燃料,出口纺织品等制成品,因此,从农业中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与中国的自我维持型的经济不同,新大陆更多依赖进出口贸易,因此,英格兰得以实现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持续进口,使初级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其稳步实现工商业的专业化。由于欧洲对殖民地的垄断,中国缺少获得这些资源的途径,资源短缺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是由于新大陆提供了资源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要素禀赋相对价格的变化使英格兰更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而中国由于资源禀赋的约束,更多地采用节约资源型的技术。因此,中西方之间技术水平的差异,其实质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类型的差异。

另外一个偶然因素是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英格兰的煤炭储藏在离市场更近的地区,因而幸运地转向了采用化石燃料。当浅层的煤炭资源耗尽时,工匠们对蒸汽机进行了重要的改进,以进一步获得能源。这些改进对于蒸汽机的自身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在初始阶段,蒸汽机非常低效,需要耗费大量燃料,以至于只有燃料几乎免费的煤矿才能使用。蒸汽机的创新和改善促进了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同时,使用煤炭减少了用于燃料的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生产,从而可以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以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相比较而言,中国煤炭资源远离经济核心地区,在铁路发展之前,成本之高难以产生任何的技术突破。因此,根据彭慕兰的解释,意外的资源暴利与偶然的资源分布使英格兰进而欧洲地区摆脱了资源约束,产生了具有突变性质的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与彭慕兰的解释相似,阿里吉等(2003)比较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家与西欧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表明,欧洲在新大陆发现之前,与亚洲一样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但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走上了节约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并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出现,而亚洲节约土地、吸纳劳动的勤劳革命在另一条道路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直至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挖掘殆尽。因而,在 19 世纪两个地区发生直接冲突时,东亚国家处于全面落后的局面。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来看,200 年前欧洲崛起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最近 50 年的东亚奇迹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之处,因为这只是对过去衰落的回应而已。

其他一些学者分析了资源禀赋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影响,深化了我们对于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认识。例如,张宇燕和高程(2006)同样强调新大陆发现导致的外部冲击对于历史大分流的影响,但是分析的外部冲击的重点在于美洲的金银涌入。对于西欧而言,涌入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偶然性的初始动因,最终形成了以保护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为经济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在同一时期,大量的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但在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商人们选择了与统治者结盟,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未能实现政治或体制上的变革。通过与彭慕兰的分析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形式上中

西方都受到了来自于新大陆的货币冲击，但是对于西方而言，新大陆更重要的作用是放松了资源禀赋的约束，而中国面临的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于要素禀赋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西方也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差异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文贯中（2006）同样强调了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指出工业革命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是良好的地理禀赋条件，即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应当与主要文明保持适当的距离，既便于吸收其他文明的主要成果，又保持相对独立。二是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即由工商业活动所内生决定的城市化，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军事原因形成的外生型的城市化。三是与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以具备内在动力能够不断吸收外部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是私有财产与自由交易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避免专制对于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是具有安全保障，以免文明的发展由于蛮族入侵而中断和倒退。在以上五个条件中，地理禀赋在工业革命之后对人类的约束减弱，然而，从长期来看，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

（五）小结

正如众多的经济学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制度因素决定了各种经济活动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从而决定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正是由于与促进市场扩展相关的制度建设的落后使中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对于西方迅速衰落，形成了历史大分流。与之相应的是，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改变了激励与约束机制，为中国经济 30 年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非由于宗教、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长期的渐进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新大陆获取的资源暴利是西方世界突破资源约束的重要条件，否则，西方世界完全有可能与中国处于相同的发展路径上。就此而言，与中国奇迹相对应的，在一百多年前同样存在着欧洲奇迹，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并非一个简单的奇迹，而是对一百多年前欧洲奇迹的回应，是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

二、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众多的学者曾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称为“东亚奇迹”。按照这一标准，在过去 30 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 10% 增长率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是当之无愧的（林毅夫等，1999；蔡昉，2006）。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而中国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① 对经济增长绩效进行国际比较的文献表明，中国的国别特征非常显著，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同寻常之处。中国经济以其快速的成长、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市场

^① 1991—2000 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 GDP 年均增长率为 6.2%，2001—2006 年下降至 4.3%，而中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0.4% 和 9.8%（国家统计局，2008，表 4—6）。

潜力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奇迹是何以发生的。

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奇迹的解释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①要素投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投入的特点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是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实际的劳动投入增长迅速,二是由于资本深化和资本广化,资本积累率较高,投资增长迅速。要素投入的迅速增加是实现经济赶超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减缓,而且随着要素数量的增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将会发挥作用,为了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技术进步体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移动,并且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是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源。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具体制度形成了要素投入与技术创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具体的制度安排涵盖的内容较为宽泛,包括基本的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它既可能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内生决定的,也可能是由主要的政治力量外生决定的。

(一) 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市场竞争与经济开放

林毅夫(1999)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以解释中国奇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资金匮乏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在建国以后,为了尽快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了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积累和运用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必须采取扭曲的宏观政策,以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为了使要素投入方向符合既定的目标,建立了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控制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使用和流转。为了使微观主体服从资源的计划配置,建立了人民公社,对私人企业采取了国有化政策。由此建立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即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传统的体制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技术效率低下和劳动激励不足。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②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即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性的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使得人均收入水平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均资本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到提升,逐渐使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这是因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改善了经营者与劳动者的激励机制,解决了激励不足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解决了信息搜集和传递的问题,提高了微观经济决

① 世界银行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亚洲奇迹包含以下基本因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收入不公平程度的降低与减少贫困、促进出口、成功的工业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及相关实用技术的转让(斯蒂格利茨,尤素福,2000)。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东亚模式的特征,因此,对于亚洲奇迹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这些基本因素大都包含在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中。

② 1952—1978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33%,低于欧洲的3.66%,更远低于日本的6.69%,仅比美国的2.24%略高(Maddison, 2007)。

策的效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矫正了扭曲的价格，改善了微观主体的外部环境。传统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被打破，市场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微观主体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将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当限制市场自发扩张的布罗代尔钟罩消失后，斯密动力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规模的扩大引发了劳动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机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韦森，2006）。

在中国渐进式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减弱，而市场自发力量不断增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整体经济的效率得到不断提高。从就业人员和创造的产值来看，国有单位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政府的干预力量和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减弱。2006 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8.32% 下降至 22.71%，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仅为 8.42%。在 1995 年以前，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国有单位相应地有所扩展，但增长的速度远低于非国有经济。在 1995 年以后，城镇国有单位就业的绝对数量持续下降，国有单位规模逐渐萎缩（参见表 1）。

表 1 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

年份	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	占城镇就业人员比重（%）
1978	7 451	18.56	78.32
1980	8 019	18.93	76.19
1985	8 990	18.03	70.19
1990	10 346	15.98	60.71
1995	11 261	16.54	59.14
2000	8 101.9	11.24	35
2005	6 488.2	8.56	23.74
2006	6 430	8.42	22.7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表 5—2。

国有企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同样呈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至 2006 年，在国有与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虽然仍占有 46.41% 的总资产，但企业数量仅占 8.27%，工业总产值仅占 31.24%，工业增加值仅占 35.78%，从业人员仅占 24.52%（参见表 2 和 3）。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有企业资金运营效率较低，在使用同样财产的情况下，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少。

表 2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年份	比重（%）	年份	比重（%）
1978	77.6	2000	47.33
1980	76.5	2002	40.78
1985	64.9	2003	37.54
1990	54.6	2004	34.81
1995	33.97	2005	33.28
1998	31.62	2006	31.24

资料来源：1978—1998 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3，表 1—5；2000—2006 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7，表 14—4、表 14—8。前者统计工业总产值包括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后者仅统计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表 3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比重 %

年份	企业数量	工业增加值	总资产	从业人员
1998	39.22	57.03	68.84	60.49
1999	37.83	56.26	68.8	58.48
2000	32.84	54.25	66.57	53.88
2001	27.31	51.72	64.92	49.16
2002	22.65	48.3	60.93	43.9
2003	17.47	44.86	55.99	37.62
2004	12.88	42.36	50.94	29.8
2005	10.11	37.65	48.05	27.19
2006	8.27	35.78	46.41	24.52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表 14—4 和 14—8 计算而得，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相关指标为 100。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者们试图建立指标体系以较为全面和客观地测度市场化进程。顾海兵（1997）分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劳动力、资金、生产和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认为劳动力与资金市场化程度不足 40%，生产与价格市场化程度约为 55%~60%，再考虑到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 40%。陈宗胜等（1999）在对市场化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从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化、经济决策的分散化、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经济行为规范化、法律化、秩序化、信誉化等方面对我国市场化进程进行综合测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从市场体系上看，我国的商品市场已经接近充分市场化，市场化程度已达 85% 以上，而要素市场体系的发育则不是很健全，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比如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只有大约 10% 左右。从政府行为来看，政府部门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在 60% 左右。从不同的产业来看，三次产业市场化程度分别为 65%、50% 和 80%。从不同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约为 6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 53% 和 5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参考了国外经济自由度测度的相关指标，对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市场化测度总指数由 2001 年的 69% 上升到 2002 年和 2003 年的 72.3% 和 73.8%，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并且强调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

樊纲等（2003）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国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樊纲等并没有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标准，而是测度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对我国各地区相对市场化程度的测度表明，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值与当地的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参见表 4）。显然，市场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表 4 2000 年我国各省市市场化总指数数据排序与评分

地区	排序	评分	地区	排序	评分
广东	1	8.41	河南	16	5.64
浙江	2	8.32	湖北	17	5.61
福建	3	8.1	吉林	18	5.51
江苏	4	7.9	湖南	19	5.48
山东	5	7.15	江西	20	5.46
上海	6	7.04	黑龙江	21	5.16
天津	7	6.89	云南	22	4.89
海南	8	6.41	甘肃	23	4.86
安徽	9	6.4	内蒙古	24	4.76
辽宁	10	6.4	贵州	25	4.62
河北	11	6.39	山西	26	4.53
重庆	12	6.33	陕西	27	4.15
广西	13	5.95	宁夏	28	4.02
北京	14	5.74	青海	29	3.4
四川	15	5.7	新疆	30	3.15
全国平均		5.81			

资料来源：樊纲等，2003，表 2。

以经济分权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王永钦等，2006）。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激励，当地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在经济分权的同时，政治集权减轻了利益集团的发展可能造成的危害，这对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结构下，以 GDP 为主的绩效考核机制产生的晋升激励，使地方政府官员有很强的动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各地的经济竞争。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外开放主要通过以下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出口导向战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缓解了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内市场需求有限的困境，出口导向型企业创造了大量产值和就业机会（尹敬东，2007）；通过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增强了市场竞争的激励程度；吸引外资流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加快经济工业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我国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沈坤荣，耿强，200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2006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相当于 1978 年的近 400 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年均 23.59% 的速度快速增长，始终保持较大的顺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与整体经济规模相比，我国对外贸易比重不断增加，说明经济开放不断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我国还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平均每年增长 16.51%。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各界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有着良好的预期，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形成了良性的循环。